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11&ZD063）



Diplomacy Beyond
Foreign Ministry

非传统外交导论



赵可金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Diplomacy Beyond
Foreign Ministry

非传统外交导论

赵可金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传统外交导论/赵可金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 - 7 - 301 - 25859 - 0

I. ①非… II. ①赵… III. ①外交 IV. ①D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9049 号



书 名 非传统外交导论
著作责任者 赵可金著
责任编辑 张盈盈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5859 - 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未名社科—北大图书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印刷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1020 毫米 16 开本 20.5 印张 350 千字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 - 62756370

目 录

导论 危机、转型与新外交 / 1

- 一、危机与转型外交 / 2
- 二、外交转型的历史趋势 / 7
- 三、外交学理论的发展 / 13
- 四、非传统外交的兴起 / 20
- 小结 / 26

第一部分 政治化外交

第一章 首脑外交 / 31

- 一、首脑外交的缘起 / 31
- 二、首脑外交的含义与特征 / 34
- 三、首脑外交的形式与机制 / 38
- 四、第一夫人外交 / 45
- 小结 / 51

第二章 议会外交 / 52

- 一、议会外交的兴起 / 53
- 二、议会外交的内涵与特征 / 55
- 三、议会外交的形式与机制 / 58
- 四、议会外交的未来趋势 / 62
- 小结 / 65

第三章 政党外交 / 66

- 一、政党外交的缘起 / 66

二、政党外交的内涵与特征 / 69

三、政党外交的形式与机制 / 72

四、政党外交的未来趋势 / 76

小结 / 78

第二部分 专业化外交

第四章 经济外交 / 81

一、经济外交的内涵与特征 / 82

二、经济外交形式与机制 / 85

三、经济外交的未来 / 89

小结 / 91

第五章 军事外交 / 93

一、军事外交的缘起 / 94

二、军事外交的内涵与特征 / 97

三、军事外交的运行机制 / 101

四、军事外交的发展趋势 / 106

小结 / 110

第六章 司法外交 / 111

一、司法外交的缘起与发展 / 112

二、司法外交的内涵与特征 / 115

三、司法外交的类型与机制 / 118

四、司法外交的发展趋势 / 123

小结 / 125

第七章 人文外交 / 127

一、人文外交的缘起 / 127

二、人文外交的含义与特征 / 130

三、人文外交的理论与图式 / 135

四、人文外交的形式与模式 / 141

小结 / 146

第八章 智库外交 / 148

- 一、智库外交重要吗? / 148
- 二、外交知识化 / 152
- 三、知识外交化 / 156
- 四、智库外交的形式和问题 / 160
- 小结 / 166

第三部分 社会化外交

第九章 城市外交 / 171

- 一、城市外交的缘起与发展 / 172
- 二、城市外交的内涵与特征 / 177
- 三、回应与争论 / 181
- 四、当今城市外交的主要议程 / 188
- 小结 / 190

第十章 公司外交 / 192

- 一、公司的外交角色 / 192
- 二、公司外交的内涵辨析与特征 / 195
- 三、公司外交的形式与机制 / 201
- 四、企业外交的使命与潜力 / 208
- 小结 / 212

第十一章 媒体外交 / 214

- 一、媒体外交的内涵与特点 / 215
- 二、媒体外交的主要内容 / 218
- 三、媒体外交的运作机制 / 226
- 小结 / 229

第十二章 网络外交 / 230

- 一、网络外交的缘起 / 230
- 二、网络外交的内涵与特征 / 231
- 三、网络外交的形式与机制 / 234
- 四、网络外交的未来趋势 / 241

小结 / 244

第十三章 NGO 外交 / 245

一、NGO 外交的兴起 / 246

二、NGO 的概念与特征 / 249

三、NGO 的外交功能 / 252

四、NGO 外交的表现形式 / 257

五、NGO 外交应注意的问题 / 260

小结 / 264

第十四章 宗教外交 / 266

一、宗教复兴与非职业外交的兴起 / 267

二、宗教外交的含义及特征 / 269

三、宗教外交的内容和机制 / 273

小结 / 280

第十五章 非传统外交的未来 / 282

一、外交的本质 / 282

二、民主化外交 / 286

三、治理性外交 / 291

四、协商型外交 / 294

参考文献 / 301

后记 / 321

导论

危机、转型与新外交

外交是一项古老的政治工具,也是当代国际体系中最久远的常设制度。从古希腊到拜占庭帝国再到15世纪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外交一直是国家体系中的核心组成要件。^①现代外交萌芽于意大利半岛,被视为“国际关系的发动机”^②或“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制度”^③,在黎塞留、卡利埃等法国外交家手中得以成形,并被英国外交学家哈罗德·尼科尔森称为“法国方法”。它的特点是以主权平等为原则,以职业外交官为主体,以国际关系原则和规范为游戏规则的交流。^④凭借职业外交家们的智慧和机智,现代外交方法成功地化解了众多危机和冲突,营造了19世纪长达一百年的和平。因此,外交是国家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战争一样同属于一个国家所必备的治国方略(statecraft)。随着近代以来欧洲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法国外交方法也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外交被法国人设计成职业外交官专业化的秘密活动,外交对于维护国际稳定的重要性被严重削弱,局限为严重脱离复杂国际交往实践的上流社会精英游戏,职业外交官垄断外交事务成为传统外交的主导范式。

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外交很少受到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不仅外交学在国

① 关于外交变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英国外交学家哈罗德·尼科尔森和荷兰外交学家简·梅利森的著作中。H. Nicolson, *The Evolution of the Diplomatic Method*, London: Cassell Publishers, 1957; Raymond Cohen, “Reflections on the New Global Diplomacy: Statecraft 2500 BC to 2000 AD”, in Jan Melissen, *Innovation in Diplomatic Practic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9, pp. 1—18.

② Raymond Cohen, “Put Diplomatic Studies on the Map”, *Diplomatic Studies Program Newsletter*, May 4, 1998.

③ Martin Wight and Hedley Bull, *Systems of States*,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13.

④ Francois de Callieres, *The Art of Diplomacy*, edited by M. A. Keens-Soper,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3; Sir Ernest Satow, *A Guide to Diplomatic Practice*, London: Longman, 1922; A. de Wicquefort, *The Ambassador and His Functions*, translated by J. Digby in 1716 and reproduced by th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Diplomacy,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1997.

际关系学中处于边缘位置,甚至有学者讥讽“外交对理论存在固有的排斥力”^①。尽管有少数国际关系学者比如汉斯·摩根索、乔治·凯南等对外交有过专门阐述,但国际关系总体上还是更关注大战略、制度设计、冲突与合作等宏观战略和政策,对职业外交官关注执行政策的社会实践等微观问题不感兴趣。^②甚至在主流理论家看来,外交没有什么学问可言,只是一些迎来送往的外交礼仪、规矩和复杂繁琐的国际法条文。阿巴·埃班就曾经指出:“没有一个世界政治的领域像外交那样表现出实践和理论之间的巨大脱节。原因在于那些专门研究这类治国术的人没有得到理论的引导,而注重理论的人还没有去关注外交。”^③克里斯特·江森从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角度解释了外交研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被“边缘化”的各种原因,即国家中心论和外交工具论等。^④总之,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外交理论化一直滞后于外交实践的发展,各国外交更多依赖职业外交家的经验,职业外交官除了需要掌握语言技巧和接受必要的外交礼仪、纪律培训外,几乎不需要接受外交学理论的学科训练,“外交无学”被广泛接受。

一、危机与转型外交

现代意义的外交是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基础上的,其前提是国家之间围绕权力展开的角逐,为调解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设立了外交主管机构和职业外交体系。尤其是1815年维也纳和会之后,这一外交体系的“法国方法”维系了欧洲百年的和平。然而,20世纪以来,战争和冲突的频繁爆发,日益动摇了现代外交体系的基础。尤其是一战、二战和冷战的爆发,使强调秘密谈判和条约外交的“法兰西方法”名誉扫地,外交成为人们诟病的对象。梅特涅、俾斯麦所创立的均势外交思想成为首要的罪魁祸首。^⑤人们热切希望能够和旧的外交

① James Der Derian, “Mediating Estrangement: A Theory for Diploma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3, 1987, p. 91.

② Geoffrey Wiseman, “Bring Diplomacy Back In: Time for Theory to Catch up with Practi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3, 2011, p. 712.

③ Abba Eban, *The New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 the Modern Ag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3, pp. 384—85.

④ Christer Jonsson and Martin Hall, *Essence of Diplomac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 12—19.

⑤ [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划清界限,建立一种崭新的外交关系。^①这一趋势被汉斯·摩根索称为现代外交的衰落,他认为,“外交衰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开始。在二十年代,少数杰出的外交家尚能对他们国家的对外政策作出重要贡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外交官在制定对外政策中的作用甚至变得更小,而外交作为进行对外事务的一种技巧,其衰落愈以明显。自从二战结束,外交行为已经丧失活力,它的职能衰退到在近代国家体系中绝无先例的程度”^②。的确,自一战以来,国际外交界就涌动着一波波改造职业外交的理论热情,甚至有学者认为外交处于危机之中,现代外交正处于转型过程之中。

尽管外交转型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对外交转型的含义却众说纷纭,没有统一的看法。有的学者将外交转型看作是外交战略调整和外交政策变化,此种观点混淆了对外政策(foreign policy)和外交(diplomacy),外交政策的调整从根本上取决于国家利益,只要国家利益发生变化,外交政策就会相应发生变化。有的学者将外交转型看作是广义的一国处理对外事务(foreign affairs)的思路调整,既包含对外政策及其外交操作的变化,也涵盖外交体制、外交思想、国际交往、国际战略、国际观念等领域的变化,此种界定过于宽泛,缺乏学术严谨性。还有的学者将外交转型看作是外交执行者的变化,认为外交需要突破仅仅由职业外交官执行的局限,将企业、媒体、智库、宗教以及广大社会行为体都纳入外交代理者范围。此种观点仅仅抓住了外交转型的外交管道层面,没有看到外交形态的本质性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区域化和信息革命的推进,全球外交转型步伐进一步加快,国际外交学界已经开始将注意力集中于如何建构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外交形态上。比如亨利·马特斯(Henry E. Mattox)、凯斯·汉密尔顿(Keith Hamilton)与理查德·朗霍尼(Richard Langhorne)、巴斯顿(R. P. Barston)、吉姆·安德森(Jim Anderson)、威廉·哈洛普(William C. Harrop)、斯特罗姆·塔伯特(Strobe Talbott)、乔治·凯南及威廉·华勒斯(William Wallace)等人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认为在信息流通自由、议题复杂、国际行为者多元的国际社会中,现代外交面临诸多考验,必须加以调整

^① Edward. 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4.

^② [美]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卢明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663—664页。

以因应新时代的需要。^① 面对挑战,近年来,世界各国都越来越重视研究外交转型问题,以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为代表已经掀起了研究外交转型的一个热潮,一大批智库推出了大量的论证报告。比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于1998年10月发表的《信息时代之美国外交再造》报告书、阿巴·埃班的《新外交》、德·代元的《论外交》、肖恩·罗丹的《新外交》以及等一系列著作关于外交未来命运的研究,认为和民族国家亦一样,外交也会终结。还有更多分析交通和通讯技术对外交影响的研究,关于媒体外交、网络外交等研究迅速兴起。所有这些研究都在学术界和政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② 不难看出,西方外交学界在努力弥合外交理论落后于外交实践发展的裂痕,包括英国国际研究会和国际研究协会等学术组织都在努力搭建平台,举办关于外交学的年会,吸引青年人加入外交学学科建设的团队,并推动跨学科的研究和交流。更重要的是,学界越来越重视缩小外交学研究和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的差距,不仅在现实主义外交、自由主义外交研究方面奋起直追,甚至以安德鲁·库珀(Andrew Cooper)和理查德·西高特(Richard Higgot)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把建构主义和组织理论用于分析个人外交官和外交机构上,引起了学界高度重视。^③ 甚至还有学者将文本分析、话语分析、社会人类学等运用到外交转型研究上,将外交转型视为更广大的人类社会转型的一部分。^④ 因此,外交转型是一个涉及领域非常广的社会转型,应该将其放到全球化时代社会转型的宏观视野中来观察和理解。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四条改造外交路线:

一是外交民主化路线。早期自由主义者边沁和康德都明确表示秘密外交

① Henry E. Mattox, "Birth of a New Foreign Service," *Foreign Service Journal*, No. 72, September 1995, pp. 138—139; Keith Hamilton and Richard Langhorne, eds., *The Practice of Diplomacy: Its Evolution, Theory and Administ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6; R. P. Barston, *Modern Diplomacy*, London: Longman, 1997; Jim Anderson, "The Future of Diplomacy," *Foreign Service Journal*, Vol. 74, No. 5, 1997, pp. 26—31.

② 有关虚拟外交研讨会的详细资料,请参考“虚拟外交首页”(Virtual Diplomacy Home Page), http://www.usip.org/oc/virtual_dipl.html。《信息时代之美国外交再造》报告书全文刊载于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上, <http://www.csis.org/ics/dia/diafrafft.pdf>, 9 October 1998。

③ Andrew F. Cooper, "Niche Diplomacy: A Conceptual Over-view," and Richard Higgot, "Issues, Institutions and Middle-Power Diplomacy: Action and Agenda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n Cooper, ed., *Niche Diplomacy*, Basingstoke, U. K.: Macmillan, 1997, pp. 1—24, 25—45.

④ Ragnar Numelin, *The Beginning of Diplomacy: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Inter-triba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 14.

是坏东西,应当废除。^①以威尔逊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主义者看来,秘密外交导致战争,出路就是推进外交公开化和民主化,在1918年1月8日发布的著名的“十四点”中的第一条便是,今后一切“公开的和平约定都必须公开达成”,“外交应当永远坦率地、在公众观察下进行”^②。外交学中的威尔逊传统被后来的自由主义者发展成为“民主和平论”^③,不仅极力推动外交民主化和社会化进程,更强调所谓的“民主输出”事业^④,甚至在冷战后演化为“转型外交”^⑤和“颜色革命”^⑥等带有进攻性的外交理论,成为当下世界外交转型的一条战略路径。

二是“外交革命”路线。与威尔逊主义强调外交公开化和民主化不同,美国保守主义者批评传统外交观对美国行为产生了太多的限制,应当用武力和强制的方式推进自由民主事业在全世界的拓展,更强调依靠美国人自己的力量,必要的时候不惜使用先发制人的战争。^⑦特别是“9·11”事件后,外交学会副会长林赛和美国对外政策高级研究员达尔德提出布什政府实施的巨大“外交革

① Esref Aksu ed., *Global Governance and Proposals for Perpetual Peace: Selected Eighteenth-Century Proposals for "Perpetual Peace" with Rousseau, Bentham, and Kant*,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2008, pp. 3—12.

② William A. Williams, ed.,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Diplomacy*, Chicago: Rand McNally, 1971, p. 79.

③ 关于“民主和平论”有代表性的论述,可参见 Michael Doyle,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Summer 1983, pp. 323—353; Bruce Russett, ed.,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iples for Post Cold War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Michael W. Doyle,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0, No. 4, December, 1986; Zeev Maoz and Bruce Russett, “Normative and Structural Causes of Democratic Peace, 1946—1986,”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7, No. 3, September, 1993; Christopher Layne, “Kant or Cant: The Myth of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2, Fall 1994; David E. Spiro, “The Insignificance of the Liberal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2, Fall 1994; Edward D. 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anger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Summer 1995.

④ G. John Ikenberry, *American Democracy Promo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316. 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缘何要输出民主》,《交流》1999年第3期,第63页。

⑤ Testimony by Secretary Rice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February 14, 2006. Condoleezza Rice, “Remarks on Transformational Diplomacy”,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8-02-12, 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on 2008-02-13.

⑥ Mark R. Beissinger, “Structure and Example in Modular Political Phenomena: The Diffusion of Bulldozer/Rose/Orange/Tulip Revolutio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5, No. 3, 2007, pp. 259—276; Joshua A. Tucker, “Enough! Electoral Fraud,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s, and Post-Communist coloured Revolutio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5, No. 3, pp. 537—553.

⑦ 参见张立平:《新帝国论在美国政治外交中的影响》,《国际政治》2003年第2期。John Ehrman, *The Rise of Neo-conservatism: Intellectual and Foreign Affairs, 1945—1994*,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Stephen Fiedler & Gerald Baker, “American Democratic Imperialist”, *Financial Times*, March 6, 2003; Edward Rhodes, “The Imperial of Bush’s Liberal Agenda”, *Survival*, Vol. 45, Spring 2003.

命”,呼吁把使用武力融入到合法的外交中去,颠覆美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和合理原则,认为“不受别国约束的美国可以使美国变得更加安全”,美国必须以一种更加自信、更为自主的态度行使自己的国家权力,为此美国可以采取单边主义、先发制人的行动以及对自己不喜欢的政府可以“采用政权更迭”的方式进行推翻而摒弃谈判。^①所有这些主张表面上强调的是通过“替天行道”来传播美国人深信不疑的基督教教义、移植英美式议会民主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灌输个人自由和天赋人权观念,实际上是彻底抛弃现有的外交范式,强迫全世界接受美国“刺刀下的和平”,其本质是反外交的革命,而不是外交的革命。然而,这一单边主义的“外交革命”很快在实践中遭到反击,反美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升温。^②新保守主义推动的外交转型遭遇挫折。

三是外交改造路线。在外交转型的研究行列中,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尽管微弱,但也不容低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向世界表明自己不愿意卷入美苏冷战,而将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自主、消除贫穷和经济发展作为自己的目标,坚持走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道路。20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依靠联合国、相关国际组织和国际法,展开了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进行的斗争,在70年代达到高潮,1974年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明确指出:这种秩序将建立在所有国家公正、主权平等、相互依存、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础之上,极大地冲击了外交秩序。与此同时,以保罗·巴兰、安德烈·冈德·弗兰克、普雷比什、多斯桑托斯、萨米尔·阿明和卡多索等人为代表的依附论在20世纪70年代异军突起,对改造资本主义依附体系、反对中心国家的地区联盟、推动经济政治一体化和改善谈判战略等提出了众多外交改革主张。^③1992年,以卡洛斯·埃斯库德(Carlos Escudé)为代表的外围现实主义崛起,地区一体化成为外交改造的主流。此外,受福柯、葛兰西和爱德华·赛义德以及伯明翰学派的影响,一批后殖民主义者批评外交不过是新殖民主义的“礼貌形式”,注重考察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关系的话语,试图解构西方外交叙事的不

① [美]伊沃·H. 达尔德尔、詹姆斯·林赛:《后外交时代:不受约束的美国》,刘满贵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② 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America's Image Further Erodes, Europeans Want Weaker Ties But Post-War Iraq Will Be, Better Off, Most Say*, 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 18 March 2003.

③ Arlene B. Tickner, "Hearing Latin American Voic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No. 4, 2003, pp. 325—350. 转引自张建新:《从依附到自主: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成长》,《外交评论》2009年第2期,第114—122页。

平等权力—知识体系,强调发展中国家争夺领导权,使自身领导合法化。^①然而,在西方外交强势话语权力下,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改造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四是国际社会路线。在外交转型的争论中,英国学派尽管也在推动外交转型研究,但更强调对现有外交传统和外交秩序的维护。从马丁·怀特和巴特菲尔德开始,就把外交视作国际社会的秩序创造制度,提出了“外交文化”“人道主义干涉”等概念。^②冷战结束后,以巴里·布赞、詹姆斯·德·代元等为代表的英国学派在国际社会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更强调以国际秩序、国际正义和维系国际社会的因素为支点,构建世界社会的新秩序,进而将个人、非国家组织以及跨国行为体引入外交,超越国家体系成为外交理论的核心,进而把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作为外交的重要维度。^③英国学派的外交转型理论更多体现为对原有外交秩序的修补和完善,而非改造和革命,在英国学派看来,外交转型就是对原有外交秩序的发展和更新,欧洲国家对“规范性权力”的强调也部分体现了英国学派的立场。^④

不难看出,上述四条改造外交的主张反映出了世界各国对外交所遭遇问题的理论敏感和实践路线,其核心均涉及外交调整和变革的问题。因此,20世纪以来的外交转型绝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世界外交总问题的一部分,只要一个国家选择进入国际体系,就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全球外交转型的总体性影响。

二、外交转型的历史趋势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贸易摩擦、人权保护、恐怖主义、气候变化、人道主义援助、公共卫生危机等议题开始成为各国政府外交政策面临的重要问题,以英国

① Geoffrey Wiseman, “Bring Diplomacy Back In: Time for Theory to Catch up with Practi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3, 2011, p. 712; S. Best & D. Kellner, *The Postmodern Turn*, The Guilford Press, 1997; S. Strega, “The view from the post structural margins: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reconsidered”, in L. Brown, & S. Strega eds., *Research as Resistance*, Toronto: Canadian Scholars’ Press, 2005, pp. 199—235.

②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hite,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John Vincent,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14—125.

③ Iver Neumann, “The English School on Diplomacy”, *Discussion Papers in Diplomacy*, No. 79, The Hague: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2, p. 7; James Der Derian, *On Diplomacy: A Genealogy of Western Estrangemen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p. 23.

④ Richard G. Whitman, *Normative Power Europe: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学派为代表的一批欧洲学者开始关注外交社会化问题,批评传统学派偏离了冷战后世界外交问题的现实,认为当今世界外交的本质在于它不仅是现代国家的一项职能,更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制度,外交研究应更多从国际法学家有关国家体系运行的思考中获得启发,他们更看重国际社会中存在的共同外交文化,即各国外交人员所共有的理念和价值观,外交是国际社会的一种经常性制度实践。^①在北欧学派和欧洲大陆学者看来,外交更是涵盖了更多的社会行为体,把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宗教组织、人文团体、网络群体等都看作是外交主体,在人道主义救援、冲突调解、危机管理等领域承担着部分外交使命。^②同时,由于非国家行为体奉行迥异于传统国家行为体的外交逻辑,更加关注环境保护、人道主义援助、人权保障、社会责任等价值议题和认同政治,这也推动了外交宗旨和逻辑的非传统化发展。美国学者虽然不大重视把非国家行为体看作是外交的主体,但也越来越强调非国家行为体作为外交的对象,近年来美国学界对公共外交、网络外交的强调反映了这一倾向。^③

总之,国际学界普遍认为,外交社会化可能推动外交学研究正迎来“令人欣喜的复兴”,“再没有比现在更好的研究外交的时代”^④。在他们看来,外交社会化可能会推动一种更加平等的、网络化的和稳定的非国家行为体外交范式的出现,让非国家行为体成为新外交秩序中的行为主体,以发展一种致力于人权、援助、发展和环保议题目标的外交知识。如果以外交权重心的变化为标准,当代外交正沿着以下三个方向移动:

一是多元化趋势。

尽管各国对外交的认识和界定存在差异,但在国家中心主义偏好上却长期存在共识。在此种范式下,外交是国家“实现其外交政策的重要手段”^⑤。除了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和最高统治者,任何其他机构和其他人所开展的对外活动均不能被称为“外交”(diplomacy)。《春秋·隐公元年》中曾言:“寰内诸侯非有

① Iver Neumann, “The English School on Diplomacy”, *Discussion Papers in Diplomacy*, No. 79, The Hague: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2, pp. 2—6.

② Paul Sharp, *Diploma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2—46.

③ B. J. C. McKercher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Diplomacy and State*, London: Routledge, 2011; Geoffrey Allen Pegman, *Contemporary Diplomacy: Repres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a Globalized Worl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0.

④ Paul Sharp, Geoffrey Wiseman, David Crikemans and Jan Melissen, “The Present and Future of Diplomacy and Diplomatic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3, 2011, pp. 709—728.

⑤ 《辞海·国际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页。

天子之命,不得出会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与朝也。”^①除非国君授命,私自“外交”是犯大忌的,即使贵为太子也不行。在西方国家,“外交”大多来自希腊语的“diploma”,如英语中的“diplomacy”、法语中的“diplomatie”、俄语中“Иностранные”,其原义是指古希腊君主或元老院派遣使节时所颁发的证明其身份的“双重折叠”的特许证书,或这种证书的“副本”(diploma,意思是证书、文凭)^②,这一含义内含着必须有最高统治者的授命,才能称之为“外交”。显然,自外交概念产生之日起,外交就具有强烈的国家依赖,唯有国家尤其是中央政府才有权开展外交,职业外交官垄断外交事务,地方政府和非国家行为体无权独自开展外交。

这一由国家特别是中央政府垄断外交的一元化格局在20世纪以来逐渐被打破,18世纪那种受牛顿力学世界观影响的非集权、自我调控的均势体系被世界大战所打破,支撑欧洲经典外交体系的那些条件和规范受到侵蚀,“对外事务越来越落入大众选出的国家领导人之手,他们对国内政治动态和公众舆论潮流更为敏感”^③。各国政府无法阻挡的各种社会行为体比如国联、联合国、IMF、世界银行、欧盟、WTO、大众性政党、特殊利益集团、民族主义情绪、社会运动、跨国公司、地方政府等越来越活跃地出现在外交舞台上。在各种地区和国际问题上,一些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力甚至比政府外交的影响力还要大。面对国家、超国家、次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日益频繁的互动图景,任何外交理论家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国家的对外活动是外交,而其他行为体的对外活动不是外交。更加令学者们头疼的问题是,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全球性媒体均在海外设立类似于驻外使领馆的代表机构和办事处,它们纷纷尝试运用过去国家外交的方法服务于其全球经营战略。比如沃尔玛用卫星和计算机系统管理着14个国家的6000多个商场和10万多家供应商,2010年的销售收入超过400亿美元。^④这些公司不仅重视参与本国政府的外交,而且纷纷重视开展与东道国政府的外交公关,重视与当地民众的沟通,履行社会责任,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经营环境。环顾世界,沃尔玛的案例已经不是特殊现象,几乎任何一家跨国企业都已经建

① 顾馨、徐明点校:《春秋谷梁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② 黄金祺:《概说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③ [美]戈登·克雷格、亚历山大·乔治:《武力与治国方略——我们时代的外交问题》,时殷弘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95页。

④ 王勇:《在中央企业“走出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http://www.sasac.gov.cn/n1180/n1566/n258237/n258854/13603116.html>

立起了覆盖世界各地的驻外机构网络,并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类似于国家外交的工具。无论就其职能而言,还是就其影响力而言,它们的行为越来越具有代表国家的外交意义。显然,仅仅将外交看作是国家和中央政府的行为已经是一种落后的外交观,全球化时代的外交日益成为一种多元化的外交,国家、跨国、次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均已经成为外交主体,参与到外交事务中来。

二是专业化趋势。

自15世纪以来,各国外交形成了职业外交官主导外交的范式,包括外交主管机构和外交代表机构。18世纪,欧洲各国开始在政府部门序列中,设立专门负责主管本国外交事务的外交部。1589年法国国王授权单独建立一个外交部门,临时管理全部涉外事务。1626年,黎塞留才在法国正式设立了第一个外交部,并设立了对外国务秘书一职,而且外交事务还与其他官僚机构混在一起,外交部除了处理对外事务外,还兼管诸如驿站、邮政总督和大西洋海军等与外交无关的事务。^①英国和美国的外交部门则起步更晚,英国指导1782年才建立外务司(The Foreign Office),1790年英国把外务司迁到唐宁街单独办公,美国直到1789年建立了国务院。一直到18世纪,“有关外交政策和外交管理应由‘外交部长’领导的单一的外交部负责的提议才在欧洲成为普遍的准则”^②。19世纪中叶以后,在西方国家的影响下,中国、日本、土耳其、印度等东方国家也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外交部。为了保持外交的统一性、连贯性和稳定性,目前各国的外交部一般设有部、司、处三个级别的组织行政结构。尽管各国外交部的繁简不一,内部构成也千差万别,但作为一个完整的执行部门,基本上都是依靠上述三个团队各司其事,联合行动,构成一个运转协调、行动高效的职业化外交执行体系,领导着一支庞大的驻外外交官队伍。长期以来,外交系统官员大多出身于外交世家,带有极强的贵族政治色彩,被称为“贵族国际”“世界兄弟会”。此外,外交官开展外交更多靠长期的职业实践形成的经验,形成了内部根深蒂固的“部门性”官僚文化,如英国外交部曾被认为有亲阿拉伯情绪,现在又被指责有亲欧洲表现;而日本的外务省在战后一直被认为具有强烈的亲美情绪。^③外交官的职业化造成的封闭性亚文化成为各国外交的一个显著特征。

然而,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经济、环保、人权、援助等新议题大量涌

① [英]杰夫·贝里奇:《外交理论与实践》,庞中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② D. B. Horn, *The British Diplomatic Service 1689—178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1, p. 1.

③ [英]杰夫·贝里奇:《外交理论与实践》,庞中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